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及启示

张斌贤*

教育经济主义是现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思潮之一,它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舒尔茨(T. W. Schultz)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适应社会发展潮流,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培养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生产功能,阐明了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理论很快被西方许多国家所接受,并迅速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即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丹尼逊和英国教育经济学家布劳格等。

一、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快发展,一些发达国家都把实现经济增长,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也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

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智力水平,培养大批高质量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不少国家延长了义务教育年限和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劳动者素质和教育事业是制约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958年,美国政府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十分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加强职业技术教育,规定从1959年到1962年由联邦政府拨款8亿多美元作为对各级学校的财政援助。日本政府1960年12月颁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最有影响的计划。它强调普及中等教育,充实科学技术教育,加强职业训练与职业指导,增设工业高中,扩充职业训练机构,增招理工科大学生,培养科技人员。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出现的经济奇迹

更使人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与经济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人力资源的质量及其开发应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关键在于教育。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研究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日趋扩大,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据统计,在1961年至1966年间,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达747部(篇),至1978年已达到2000余部(篇)。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教育经济主义思潮迅速形成并波及世界各国,成为一种流传甚广的世界性教育思潮。

在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是人力资本理论。美国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源地,早在1935年,经济学家沃尔什(J. R. Walsh)发表了《人力资本观》一文,首次采用“费用”、“效益”等概念分析不同教育程度的教育费用和毕业后因能力提高而收入增加的情况,得出各级教育的收益率。沃尔什的研究方法对后来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有关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舒尔茨以农业经济学为基础开始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1959年发表题为《人力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论文,1960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对人力资本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震惊了西方学术界,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此后,舒尔茨又发表了大量有关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初步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除舒尔茨外,美国经济学家丹尼逊(E. F. Den-

* 张斌贤,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

ison)对经济增长的智力因素分析,贝克尔(G. S. Becker)通过对家庭行为分析提出个人教育支出的经济效益计量模式,明瑟(J. Mincer)等人关于人力投资与收入分析相互关系的研究,雷克(M. Reick)等人围绕劳动力市场提出的“劳工市场分解理论”等在美国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形成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人力资本理论风靡一时,在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中独占鳌头。

在西欧和日本,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同样来势迅猛。如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学者德博韦(M. Debeauvais)和英国经济学家维泽(J. E. Vaizey)合写的《教育发展的经济主义》一文,法国学者帕尔内的《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罗斯洛的《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等论文,都阐述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60年代中期,包括英国教育经济学家布劳格(M. Blaug)在内的许多西欧学者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教育对实际就业的影响、制约教育系统的经济活动和劳动方式、分析教育投资所占比例与按人口计算经济收入发展指数之间的关系等。德国学者在60年代末到90年代则更热衷于从教育规划角度提出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主张,如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以及教育规划的方法和技术等发表了大量论著。日本文部省1962年发表了教育白皮书《日本的经济增长与教育》,指出日本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并将教育投资视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经过七八十年代的扩展,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它的顶峰。

二、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

由上可知,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不同时期都有所发展,它所形成的理论和观点也纷繁驳杂,但以探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为核心,以教育的经济功能规范其价值取向,突出教育的经济性则是它们共同的特征。

(一)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核心概念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

物质资本相对应,最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提出,后由舒尔茨给予了理论上的阐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资本只包括物质设施、建筑物、器材和物资库存等,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府贬低人力资本投资、抬高物质资本投资的固执态度的原因。舒尔茨认为,这种反常的投资减少了生产和福利的潜力,理想的投资方式应该是增加那些可能产生最佳预期收益率的资本形式。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尤其显得重要。他指出当代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正是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加的结果,欧洲许多国家和日本人口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了明显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把人力资本投资分为五个方面:即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包括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力的全部开支;在职培训,包括由商会组织的旧式学徒制;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不是由商会组织的成人教育计划,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校外学习计划;个人和家庭进行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

舒尔茨认为,在上述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投资,“人们应该而且会继续高度评价教育对文化的贡献,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们无视教育对收入的贡献则是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在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工业来实现丰裕方面,教育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教育投资具有两重性,即消费性和生产性。教育投资的生产性在于它能够开发人的潜力,增长人的才干,包括文化知识、技能以及良好的素质,从而提高劳动者质量,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同时也能增加个人未来的收入。因此,无论是国家投资教育还是个人投资教育,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经济方面的收益。“教育远不是一种消费活动,相反,政府和私人有意识地作投资,为的是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它蕴藏在人体内,会在将来做出贡献。”

舒尔茨对教育投资的效益进行了测算,这种测算及其结果不仅成为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风靡世界的重要支柱,而且也是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依据。在他看来,教育的收益分为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方面,教育的个人收益主要有五项:未来较高的收入、未来较健康的

身体、未来较强的企业工作能力、未来合理安排家庭生活的能力、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舒尔茨认为,一个人受教育后的收益除了他每年的收入外,还要看他受教育后能工作多少年以及工作能力的不断提高程度。据丹尼逊的测算,大专院校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之间总收入差异的60%从统计上而言可归因于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对父亲的职位、中学班上排名及智商差异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平均有1/3的差异就消失了。关于教育对社会的收益,据舒尔茨的测算,1929年至1957年,提高教育程度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3%。

人力资本理论由舒尔茨提出后很快被人们接受,成为很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对这些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极大。尽管人力资本理论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它所提出的基本思想,即把人具有的知识、能力、以及劳动合质量的提高看作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

(二)教育筛选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石油危机的出现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受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以及高失业率的冲击,这些国家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发生矛盾带来种种问题,如“文凭膨胀”、“过度教育”、青少年失业率高以及劳动生产率下降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困境,希望用发展教育和实现平等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人力资本理论也不能解释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人们开始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怀疑,新的理论便应运而生。

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L. Thurow)发表《教育与经济平等》一文,首次阐述了教育筛选理论的一些观点。这一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认识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教育的作用在于对具有不同能力的人进行筛选。索洛指出:“教育和正规培训是筛选工人的极为重要的背景特点,以至于教育分配的改变对劳动阶梯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筛选过程中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否比其他因素更重要些,虽然各种职业之间

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教育的筛选检验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

1973年,经济学家迈克尔·史潘斯(M. SPence)发表了《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接着陶布曼(P. Taubman)等人也发表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等一系列论著,进一步阐述了教育筛选理论。筛选理论认为,雇主与求职者劳动力市场相遇时,由于彼此缺乏供选聘使用的完全信息,而必须依靠一些“信号”去互相沟通,反映求职者教育水平的学历便成为雇主识别求职者能力的“信号”。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是雇主鉴别求职者能力,对他们进行筛选并安排在不同岗位上的一种装置。筛选理论也注重探讨教育与工资(收入)的关系,但却提出了与人力资本理论不同的观点。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提高受教育程度就能提高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的工资,如图式:教育——劳动生产率——工资;而筛选理论认为,教育水平只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并没有改变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它在本质上只是“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一种“信号”,因此教育的经济效益源于它在劳动力市场所起的筛选作用,如图式:教育——筛选——工资。筛选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雇主对雇员的学历要求超出岗位需要,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结构没有变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能促进社会平等。反之,如果过分依赖学历文凭作为选聘的依据,而没有协调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严重后果。如教育的过分扩张与经济的缓慢增长会造成“文凭膨胀”现象,原因就在于教育的作用是筛选识别人的能力,它并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扩张教育也无助于经济的增长。

筛选理论描述和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困扰许多国家的教育文凭膨胀问题,因而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筛选理论也得到了一些教育经济学家的赞同和认可,并使有些持人力资本理论的学者转而认真思考筛选问题。人力资本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布劳格指出,如果筛选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人力资本理论那里所得到的结论全是错误的。但筛选理论片面强调教育的信号

筛选作用,进而否认教育提高人的认知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作用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一些学者试图另辟蹊径,把筛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结合起来,主张教育具有提高生产率和提供筛选信息的双重作用,这标志着筛选理论在认识上的进步与发展。

(三)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的,其代表人物有皮奥里(Piore)、戈登(Gordon)、多林格(Doeringer)、卡诺伊(Carnoy)等。1971年,美国学者多林格和皮奥里出版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及人力分析》一书,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初步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的作用以及教育与工资关系的分析,没有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内部结构,在劳动力市场不同部分中教育与工资的关系是不同的。皮奥里还明确提出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他说:“双重劳动力市场能最好地解释就业和人力安置在贫困永久化中所起的作用。双重市场的一部分,即主要市场提供的工作具有如下若干特征: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权利平等、在工作制度的行政管理上具有适当的程序,并有晋升的机会;另一部分,即次要市场,其工作明显地不像主要市场那样吸引人,这一市场的工作往往是工资低、工作环境低劣、就业变化性大、要求苛刻、随意给予纪律处分,以及晋升机会很少等等。”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戈登、卡诺伊等进一步发展了皮奥里和多林格的理论。他们采用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劳动力市场结构,说明不同种类或不同阶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如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率不大,个人工资收入主要由其所在的劳动力市场性质决定。一般说来,主要劳动力市场往往雇用男性、白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往往雇用女性、有色人种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教育与工资有显著的正相关;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教育与工资的相关程度微弱。1980年,卡诺伊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划分》一书中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四个部分,即“具有普通高等教育水平”

的劳动力市场、垄断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手工业劳动力市场。他认为各种劳动力市场的差别反映了社会结构的矛盾和一定的社会关系。

由于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倡导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有所不同,因而对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划分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注重从教育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角度研究教育的经济价值,认为教育水平高低不仅是不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标志,而且是构成不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这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提高个人认知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的主张大相径庭,而与筛选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一理论受到西方一些激进教育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认为它不仅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劳动力市场的产生、特点及其与教育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解释了实践中困扰各国的失业问题,并探讨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四) 社会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激进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教育家鲍尔斯和金蒂斯。1976年,鲍尔斯和金蒂斯出版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一书受到了西方教育理论界的高度重视,成为激进派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教育经典著作,书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被称为社会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采用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阶级矛盾关系的反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认知技能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现代生产中大多数职业所要求的认知技能水平并不高,雇主更加重视劳动者是否具有合适的个性品质,如能否遵守规章制度、服从安排,将企业规则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动。雇主采用教育水平作为筛选劳动者的标准,并不在于将它作为衡量雇佣对象的认知水平,而是作为鉴定其个性品质是否合适的标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等级化和分工化,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个性特征。如经理、高级行政人员等工作需要较强的独立自主、自尊心、

怀疑态度及进取创新等个性品质,这些个性特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系统地培养。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途径及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阶层的学生经教育培养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种种个性特征。美国教育史学家斯普林(J. Spring)认为:“20世纪学校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作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社会事业机构所起的作用。学校教育为接受有统治权的社会事业机构和杰出人物的控制铺路,使人们按专家和组织机构的决定行事。”

社会化理论认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建立在教育服务经济的基础上,经济完全支配了教育,教育内部的组织特点反映了经济内部的组织特点。学校教育是通过社会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学校教育的社会化职能在于使未来劳动者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和习得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个性品质。学校教育对不同阶层学生的不平等待遇,反映了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且再生产了这种不平等。这种观点在当代西方理论界受到广泛的重视。社会化理论可用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平等教育政策不能改变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因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经济不平等,教育改革不能改变经济的不平等结构。这一理论的缺陷是忽视了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对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教育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三、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启示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成为教育理论界的热点绝非偶然,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教育发展的方向,符合现代生产、经济和科技发展对教育的客观需求。它的广泛传播不

论是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理论认识,还是对教育、经济甚至社会改革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教育的经济效益”、“教育与就业”、“教育资源的配置”等,不仅成为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研究的热点,而且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主要是沿着经济性方向进行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把教育纳入经济发展的战略轨道,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采取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措施,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教育发展政策的主要依据。教育经济主义思潮至今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许多方面揭示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客观规律,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它在强调教育的经济意义时,却发展为“经济至上”论,从而对教育的整体社会功能缺乏全面认识,甚至将教育的经济功能与教育的政治、文化功能对立起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被青少年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上升、教育的人文精神丧失等问题所困扰,人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却陷入了精神上的贫困,这与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无关系。随着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日益高涨,它受到的质疑和批评也越来越多。正如法格林和萨哈指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教育对提高人的生产力的投资价值实际上未受到质疑;但到60年代末,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可行的发展策略的基础则遭到了怀疑……到70年代初,把教育看作是发展的一种灵丹妙药的信念已经进入了被怀疑的时期。”

(本文摘自张斌贤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08-517页。)